

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 编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3/4 字数：270千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精装本：0001—1,000册 定价：1.30元

平装本：0001—6,000册 定价：0.78元

书号：3049·102

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民族学的新开端·····秋 浦 (1)

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梁钊韬 (9)

我对民族学的看法·····马 曜 (20)

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侯方岳 (28)

在实践中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黄惠焜 (38)

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学科学体系问题的探讨·····刘伯鉴 (46)

当前我国民族学的特点和任务·····金天明 杨庆镇 (64)

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陈国强 (77)

发展我国的民族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黄淑婷 (84)

社会形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的地位·····杨鹤书 (93)

论民族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陈启新 (110)

略论民族学的定义和对象·····刘孝瑜 (127)

浅谈民族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吴从众 (136)

建立与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的几个问题·····周光大 (146)

有关民族学建设的若干问题·····李孚同 (156)

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体系·····汪宁生 (164)

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几个问题·····施正一 (169)

从民族学的名称说起 ····· 汤 正 方 (181)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和历史学紧密结合 ··· 宋蜀华 (194)

论“语言民族学” ····· 马学良 戴庆厦 (207)

民族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 ····· 肖家成 (220)

试论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关系 ····· 张亚英 (231)

民族学在云南 ····· 江应樑 (236)

蔡元培和民族学 ····· 胡起望 (251)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 ····· 陈永龄 王晓义 (261)

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派 ····· 杨 堃 (300)

简论博厄斯与美国历史学派 ····· 吴泽霖 张雪慧 (319)

· 学术动态 · 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 (338)

民族学的新开端·

秋 浦

筹备已久的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的举行，标志着民族学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所经历的曲折已成历史陈迹，民族学在我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开端，并且这将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四年多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对开展今后的民族学研究，也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贵州省的党政负责同志和各方面的代表，这体现了多民族的贵州省对民族学工作的关怀、支持和企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赞助这项工作并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多年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老同志，有解放以后才投入这项工作的新战士，并且有着来自不同地区兄弟民族的代表参加了这个行列。这说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进军的征途上，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发展民族学的有关问题，都愿意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贡献给这一科学事业。

我们都是为着追求科学的真理而来的。科学所反映的是事物

• 这是秋浦同志1980年10月20日在贵阳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文中提出祇有认真提倡、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正确方针。《民族学研究》的出版，正是为我国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一块百家争鸣的新园地。——编者

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能否做到这点，并不单凭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占有大量的材料，对之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从而得出必要的结论。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绝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在这段话里讲了三个意思：研究问题必须全面地占有材料；这样才能少犯错误；但一般是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说，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只能不断地接近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全地最终地认识真理。正因为如此，在向真理探索的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一些认识上的错误，是允许的，是一种正常的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而且应当看到，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然，这绝不是提倡大家去犯错误。而只是说，如果犯了错误，并善于认真总结，从错误中进行学习，那就可以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在今后少犯或不犯类似错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会成为正确的先导。再者，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是与非，正确与错误，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人们所分辨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认真提倡、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正确方针。无数实践证明，对待科学，对待思想认识上的问题，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害。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对待学术问题，对待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也应当认真提倡、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方针。我们要树立一种平等地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的优良学风。要坚决实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而且应该加上另一个“不”，即对学术争论不急于作结论。结论

当然会有的，也是应该有的。这需要每个人自己去作。这需要时间，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这一意见或那一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站得住脚。即使经过时间和实践证明某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也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保留，绝不要强加于人。既坚持真理，又修正错误，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待科学事业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次学术讨论会，将以研究和讨论民族学学科本身有关的问题为中心。什么是民族学，它的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是什么，如何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资产阶级民族学有何区别，民族学研究如何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等等，将是会议所要讨论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一些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和看法原来就不尽相同，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就使这一问题更显得混乱不堪，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甚至把整个民族学视为禁区，令人望而生畏。要打破禁区，把这一问题讨论好，并逐步引向深入，有必要扫除障碍，做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工作。不如此，人们是无法从多年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是难于做到解除心有余悸的顾忌，畅所欲言，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的。

科学和迷信本来是势不两立的，两者之间的斗争也是从来不可调和的，有时甚至是极其残酷的。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由于坚持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不是宇宙的中心，而触犯了当时宗教的禁律，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在罗马活活被烧死。与布鲁诺同一时代，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由于支持和发展了地动说，于七十岁时还受到教廷圣职部的审判，并被终身监禁。自然科学在其发展道路上尚且需要经受如此严重的折磨和迫害，与阶级斗争关系密切的社会科学，每前进一步，如果不需要冲破阻力，不需要跳出禁区，那就更是难以想象的了。因之，不破除迷信，思想就难以完全解放，科学也就难以得到发展。

科学和迷信完全不同。科学来源于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不是迷信，因之从根本上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只能是来源于实践，是近代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所吸收的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也是对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斯大林说：“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象，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因之要尊重科学，发展科学，首先就要忠实于客观实际，忠实于客观真理，尊重实践的检验。我们历来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民族学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民族学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不如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容易迷失方向。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实践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万古不变的宗教信条，它的理论原则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我们绝不能离开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去照抄照搬它的现成的词句、公式。

我们期望着通过这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讨论，并通过以后的不断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能够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需要并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我国民族学的道路。

找出一条适合我国需要并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道路，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民族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的职责。要担当起这一职责，除了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并掌握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武器，用以指导我们的民族学研究工作而外，还应当使我们的民族学深深地植根于我国各民族人民所生活的土壤之中，从中汲取滋补的养分。谁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学材料的国家。截至解放时为止，我国仍有人口约七十万、为数多达十几个

的少数民族的全部或一部分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有人口约百万的彝族地区停留在奴隶社会，有人口约四百多万的藏族、傣族、门巴族等地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其他业已进入阶级社会的一些民族，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残迹。而所有这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在经历了解放后的种种变革，今天正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都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例如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如何行使自治权利的问题，如何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发展少数民族人口问题，民族发展与民族融合问题，社会主义民族形成问题，等等。我们有责任对于这些民族的现状和历史，共性和特性，发展中的问题，向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而不是零碎的、随意的调查。向人民群众作调查，也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拜人民群众为师。我们的民族学材料既来之于人民，它当然也为人民所需要，为人民所欢迎。我们应当经常地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有些行将消亡的社会现象，更应刻不容缓地进行带有抢救性的调查。与此同时，在调查的基础之上，还应首先就一些专题、一些地区或一些民族分别地进行研究，写出一批专著。过去各地已分头地作了这些方面的不少工作，今后当然还要继续下去，并希望能开始作些综合研究，写出诸如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中国的民族学等这样一些扎扎实实的理论著作，来丰富人类历史的知识。

不仅如此，应当看到我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学材料的国家。古往今来，有多少在政治舞台上业已消失了的民族和现时仍在活动着的一些民族，他们的种种活动：在艰苦条件下向大自然的斗争，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迫进行的迁徙，长期历史所形成的特有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融合，曾经出现过的某种不和，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所有这些，在我国浩繁的典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的典籍）中，在流传民间的各种手抄本中，几乎都有着不同的记载。

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又一丰富的材料来源。把它与当今的现实生活互相印证，与通过调查所得到的传说材料互相印证，既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今天，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过去。这一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所罕有的优越条件，为发展我国的民族学增添了异彩，也是我国民族学所具有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十分珍视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辉。

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甚至夜郎自大。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外国的民族学在内，采取全盘接受、生搬硬套，固然为我们所不取法；但一概拒绝，甚至一棍子打死，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都曾有过的，要牢牢记取，再不应该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实事求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区别对待。经过分析研究，凡是外国民族学中唯心的观点，错误的方法，当然应该加以摒弃，而对于一些值得借鉴之处，也应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经过消化拿来为我所用。不可设想，发展我国的民族学，而不需要吸收人类一切的优秀文化。按照列宁的说法，“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吸收外国民族学中一些有益的成分呢？

同时应该认识到，我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我国这一民族学宝库而外，在世界各大洲，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风土人情迥异，那里同样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族学材料，有待于发掘和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可以设想，这种研究，将会大大开拓我们的视野，有利于我们就国内外的许多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全面了解和揭示民族发展的规律。这对于发展我国的民族学，应当看作是同样不可缺少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总之，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需要并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我

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道路，我们应当多方面的作出努力，而且需要持续不断地作出努力。“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我们应当具有这种一往无前、勇于探索的精神。

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民族学既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法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也和这些学科一样，都是我国社会科学园地中所不可缺少的一支花朵。民族学研究对现实的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将会对党和国家制定民族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对民族地区如何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从实际出发的科学依据。对于这门学科，我们应当辛勤地浇灌它，培育它，使它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摧残之后，能够比较快地恢复生机，放出艳丽夺目的光彩。

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经过一年多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举行的。应该说，提交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数量是很多的，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也大都具有一定的质量，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意味着民族学研究确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新的开端。但限于时间，不允许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吸收别的会议的经验并根据一些同志事前提出的意见，这次学术讨论会之所以把民族学学科本身有关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主要是为了便于集思广益，把当前大家比较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一次集中的深入的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了解到在哪些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又在哪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以便于会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这样做，比在广泛的问题上漫无边际的讨论，或许效果要好一些。如果通过会议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今后每次举行民族学学术讨论会时，也都可以确定一个中心，把这种做法持续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对其他问题进行适当的讨论。适当地讨论其他问题，和会议有一个中心，这是并不矛盾的。

这次学术讨论会，还将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酝酿正式成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作为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和推动全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相信经过这次学术讨论会之后，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的组织和推动之下，在全体从事民族学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之下，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工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的民族学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在跨入八十年代的第一年，祖国大地，到处春意盎然。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让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与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整齐步伐，更加勤奋踏实地工作，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发展这一门学科而努力，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园地而努力，同时也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

梁 钊 韬

对民族学的对象、内容、范围、研究方法和任务，以及其他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建立和发展我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走中国式的道路，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下面也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新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目前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成员，随着民族识别遗留问题的解决，今后可能还会增加新的民族成员。解放前，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有一部分处于三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但亦有为数不多的民族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活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民族学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这方面的材料，是世界各国所罕有的。这是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的极大优越条件。

我们党一向重视民族调查研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解放前，在延安曾创办过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一些民族研究的老前辈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民族的社会情况，进行民族学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解放后，不

但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和民族研究所；在许多民族聚居地区也相继成立了民族学院和民族研究所。特别是，从1956年开始，为了配合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党和国家从各地的民族研究机关和大专院校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庞大的队伍，对全国民族地区进行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现状、历史和语言的调查，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研究资料，据粗略估计约有数千万字之多。这些资料所涉及的面很广，计有：（一）民族语言，（二）民族识别，（三）社会形态，（四）民族历史，（五）宗教信仰，（六）文学艺术，等等。这些调查报告，无疑是我国民族学研究极其珍贵的资料。通过长期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材队伍，积累了可贵的经验，研究水平亦不断提高。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有关的科研单位和学校还组织专人编写出各民族的简史简志和民族语言方面的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民族工作者干劲倍增，正在埋头研究，修订各民族的简史简志，其中有些经过修订完毕正式出版。这一调查研究工作，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说是史无前例的。

三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在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还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四人帮”垮台后，中断整整十年的民族学科研和教学工作都得到迅速恢复。一些民族研究单位，正组织人力进行民族专题研究或写出有关专著。一些高等院校已经或准备编写教材，开设民族学课程。

应该提一下的，解放后从旧社会过来的虽则为数不多的民族学专业人员，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引下，解放初期即参加了民族调查研究和教学工作，接受党的教育，改变了旧的立场观点，积极为党的民族工作和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服务，在研究工作或培养人材方面都作出了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部分老专家、学者，正焕发了革命青春，继续为党的民族研究工作献出他们的有生之年。有的还到国外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研究的成就，得到国外同行学者的推崇，为祖国增光。

上述关于我国解放以来对民族研究资料的积累、研究的成果和专业队伍的壮大等等，说明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自己的民族学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已是肯定无疑的了。我相信，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民族学教研人员的努力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定能建立起来，并迅速成长。

二、批判继承外国的民族学

谈及建立中国自己的或中国式的民族学，并不意味着排除外国一切民族学便可以奏效。我们还有一个批判与继承外国民族学，活跃我们的学术思想，加强我们战斗力的问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本民族学著作。全书贯串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它通过一些民族的典型材料、考古学材料和文献资料，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为中心，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科学理论，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学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顺序的原理，经过我国半个世纪以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和运用这个规律解决一些民族问题的实践检验，业已证明它的结论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正是民族学发生和形成的时代。他们密切注视西方民族学的著作和动态，以一分为二的批判与继承的态度，采取其有用之处，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观点。例如对西方民族学界称为“十九世纪文化学先锋”的巴士棠于1895年出版的《历史上的人》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批判其唯心主义的“文化学”部分，但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指出其中一些民族志上的资料，仍有可取之处。1861年巴奇芬的《母权论》，1876年麦克伦南的《古代史研究》这两部在当时影响甚大的著作

出版后，恩格斯肯定了巴奇芬关于母权制普遍存在并且是父权制的先驱的学说，肯定了麦克伦南所提出的族外婚到处流行一说的重大意义。但同时批判了巴奇芬认为家庭的变化发展不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取决于宗教观点的错误；又批判了麦克伦南的族外婚与族内婚部落之间是对立并存的，及母权制起源于杀害女婴的习俗等错误观点。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仔细地研究了这部著作。1880—1881年，马克思详细地对这本书作了补充和批评，写成《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执行他的遗愿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社会》这部带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的民族学著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中的优点，摒弃它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重新写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民族学著作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书之前，而且表现在成书之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出版的那一年，即1891年，惠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一书出版，反对摩尔根的原始杂婚的论点，认为现代的一夫一妻家庭是自古就存在的。恩格斯敏锐地知道这个学说的实际意义，立即在第四版中予以驳斥，指出惠斯特马克关于类人猿一夫一妻制的主张，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报告，都是自相矛盾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族学知识还不很发达。恩格斯所能运用的民族学资料也受了限制。但是，恩格斯还是不懈地注视民族学的发展，和当时资产阶级科学界对这门科学的反动倾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维护科学真理，在科学理论上的战斗精神是我们中国民族学应该继承下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民族学在变化。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民族学的视野扩大了，深入考察殖民地民族社会内部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现象，于是相继出现各种流派。同时，由于他们生存在帝国主义时

代，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看法也跟着当时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愈加错误，形成了越来越与唯物主义相反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于是西方民族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舆论工具，和训练殖民地官员的必修课程。二十世纪前上半个世纪中，西方民族学思潮越来越走向更为错误的地步，并把这些错误的理论运用于殖民统治，和研究工人阶级社会生活上，前者成为殖民行政的谋士，后者成为垄断资本家加强“管理”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上述二十世纪上半世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变化，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摩尔根时代所未能注意到的学术上的视野问题。摩尔根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唯心论和唯物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一夫一妻制家庭和私有财产制度是否永恒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批判对象是封建主义，他们歌颂资本主义道德观念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形态。当时民族学的流行思潮是古典进化论，承认社会进化阶段，因而自发地产生与历史唯物主义接近的观点。后来由于视野扩大了，人们考察到比摩尔根更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文化现象，因而批评古典进化论在材料上的不周，争论的性质开始时属于学术问题。古典进化论以后的各种流派被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成为殖民地统治和加深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工具。它的性质便转变为政治问题。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学，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治学精神，致力研究，一分为二地予以批判和继承。

这一段世界民族学史，上了年纪的民族学者都曾涉猎过，这里毋庸多所论述，只就它的学术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谈谈下面三个问题。

1. 关于传播论理论。这种理论，开始便是反进化论的。如德国的格纳那和先为进化论观点后改为传播论派的利维斯等人，发现了许多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不仅是纵面的进化，且有横面的传播现象。他们比较深入细致地观察社会现象，把民族学调查研究推进了一步，为摩尔根时代的民族学所不及。当我们在调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确存在各族人民